**主題文章**

**…………………………………………………………....................……………………**

**散聚宣教個案研究 —**

**德國華人教會與其多維度功能目的與跨文化潛能之探索**

 **馬天濟 / 陳思瑾** [[1]](#footnote-1)

**編者註：**這篇文章的另一個略有不同的版本已經發表在德國學術雜誌“Interkulturelle Theologi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跨文化神學宣教學雜誌》）48/2期（2022年），第161-184頁。經出版社允許，在原來版本的基礎上做了語言與處境化的改動。

**前言**

本文聚焦於德國境內的移民教會，是一支在東亞民族中數量突出的、以中國籍華人為主體的華人移民教會，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崛起，他們逐漸引起關注。[[2]](#footnote-2) 目前關於德國的華人移民教會的研究

仍然相對較少。我們將重點關注在德華福音會（Forum für Mission unter Chinesen in Deutschland，簡稱FMCD）網路中具有濃厚福音派特色的華人移民教會，他們在散居教會群體中具有顯著的存在感。[[3]](#footnote-3)本研究特別關注他們在華人移民生活和信仰中扮演的功能角色之闡述，在其中對於其跨文化潛能的思考尤其重視。此外，雖然本文的焦點在德國的華人散居教會，但基於其觀察、分析和推論所得出的基本理據邏輯和發現，可以延伸至散佈在全球的許多華人散居教會。

# 1. 方法論反思

 由於本文作者緊密參與在華人移民教會之中，因此進行探索性研究并沒有太大困難。作為福音派神學家和具有移民背景的個體，雙重視角使得研究具備了科學客觀分析與豐富一手經驗的互補性。[[4]](#footnote-4)這種研究視角還具有一個優勢，即研究人員與研究物件之間存在著信任基礎，以便能夠在盡可能自然的背景下接近現實並從親身參與者的內部視角來理解。然而，這種方法的邊界和挑戰也需要被揭示並進行批判性反思，並且在研究過程中始終對此保持意識。由於研究人員從一開始就深度參與其中，因此缺乏對理想化接近過程的考察，即研究人員從“外來者”到成員的角色轉變。可能缺乏的距離感和不足的中立性可能導致忽略一些觀察要點的盲點，無法真正認識或錯誤評估其重要性。因此，本文作者始終努力納入西方科學家的補充視角。

 除了使用文獻研究外，還採用了參與觀察的方法。[[5]](#footnote-5)在2018年至2022年期間，筆者們在整個德國範圍內參觀了德華福音會網絡中的七個華人教會，還參加了其他跨教派的會議、小組、線上群組和一個跨教派的青年團契。通過參與華人基督徒的自然生活環境，建立直接的個人關係，並進行了大量的非正式（自發或主動引導的）對話和訪談，按照預先準備的觀察指南收集了資料。關於評估方法，採用了紮根理論 (Grounded Theory)。[[6]](#footnote-6)在資料收集過程中，已經針對華人移民教會的功能以及其跨文化潛能發展了各種假設，並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

**2. 在德國的華人移民和華人移民教會**

## 2.1 在德國的散居華人

 雖然華人在德國的移民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但散居華人在德國社會中的存在和重要性直到最近幾十年才變得明顯起來。[[7]](#footnote-7)他們當前複雜的社會經濟構成是由不同時期的移民潮所造成的。[[8]](#footnote-8)

一些學術研究中記錄了大陸中國人和其他華裔/華人之間微妙的社會文化差異。[[9]](#footnote-9)其中，“華人”一詞可以指五個有所區分且相互重疊的類別：（1）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公民（“中國人”）；（2）臺灣、香港和澳門的居民；（3）通常持有中國護照的移民（“華僑”），儘管在日常交流中很少使用，但在中國大使館等官方場合仍然重要；（4）作為華人後代、在客居國出生並接受當地教育的華裔，他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歸屬感通常較少或幾乎沒有；（5）一個更廣泛的定義，涵蓋了所有先前類別，尤其是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和其他國家的華裔人士（“文化華人”）。通常海外華人是指包含中國僑民及這一更廣泛的“華裔/華人”定義聯繫起來。這些類別並不是清晰可界定的定義，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有所不同，並且可以根據語境具有一定的靈活性。[[10]](#footnote-10)

 關於目前居住在德國的華人數量，在不同的定義標準下（國籍、母語或移民背景），導致了非常不同的結果，無法準確估計。根據2020年的數據，僅考慮中國大陸公民及其後代的狹義定義，德國估計有大約201,000名華人，其中157,000人（78%）屬於具有自己移民經歷的群體，也就是第一代移民。[[11]](#footnote-11)第一代華人移民的平均年齡為25.5歲，他們入境時的平均年齡為24.0歲。大約35%的第一代華人移民在德國停留不超過五年，[[12]](#footnote-12)這可能與學生移民的比例較高有關。由於較低的學費和生活成本，德國成為了中國學生的熱門目的地，他們在畢業後留在德國工作，有望成為高素質移民群體。此外，新移民也越來越多與商務移民有關。然而，傳統的族裔群體壁龛（ethnic niche）及其經濟生態仍在德國的華人中起著一定的作用：在2001年，46%的男性和29%的女性從業者在餐飲業或物流業工作；許多非法移民在這些行業中隱藏自己。

## 2.2 德國華人移民教會

 華人教會的歷史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跨國現象，其與宣教和散居密切相關。[[13]](#footnote-13)蘇文峰揭示了華人教會歷史上的迴圈運動，從中國大陸開始，傳播到臺灣、香港和東南亞，然後繼續傳播到北美，最後又回到中國大陸。[[14]](#footnote-14)目前引人注目的是全球華人教會龐大的跨國網路，他們共同努力，希望能夠傳教給更多的華人，並在世界各地建立和發展華人教會。[[15]](#footnote-15)自2000年以來，歐洲也成為福音的重要中轉站，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和學者來到歐洲，尤其是英國、法國和德國。 [[16]](#footnote-16)

 德國華人移民教會起源於1970年代末的一次難民危機，西德政府收容約四萬名越南船民(Boat People)。由於越南船民中華人佔頗高比例，於1978-1979年，在海外基督使團（OMF）宣教士夫婦葛忠良與葛華白蘭（Siegfried and Elisabeth Glaw）的領導下，成立了第一個華語查經班。1985年，葛忠良相繼在漢諾威成立了中文圖書館和德華福音會，作為一個獨立的平臺，旨在促進不同宣教團體之間的合作，特別是為宣教士們提供後勤支持。[[17]](#footnote-17)

在過去的四十年裡，根據德華福音會的說法，德國已成立了約70多個查經班和教會。[[18]](#footnote-18)由於缺乏財力資源，這些華人移民教會通常由來自臺灣、香港和美國等國家的宣教士領導，他們受到德國以外的教會或宣教機構的派遣和支持。[[19]](#footnote-19)儘管這些宣教士來自不同的文化和神學背景，但大多數教會在都表現出明顯的福音派保守、跨教派的特點。[[20]](#footnote-20)

在德國的華人基督徒組織中，可以區分成三種不同的組織形式：教會、團契和查經班。在一般情況下，團契和查經班都受到一個教會直接或間接的領導，並形成一個地區性的聯盟。教會和團契之間的區別並不是很嚴格，可能涉及參與者的數量和是否有主日崇拜儀式。然而，一些團契也會舉行自己的崇拜儀式，進行聖禮，並在德語中自稱為教會（Gemeinde）。團契通常涵蓋了廣泛的功能性和實踐性主題，如家庭關係或當前社會討論，從基督教的角度加以探討，而查經班通常以考察聖經為中心。

根據地理分佈，與德華福音會有關的大多數華人移民教會、團契和查經班位於德國的大都市地區（圖1）。平均而言，這些華人移民教會屬於小型和中型教會，崇拜參與人數在50到100之間。根據德華福音會的說法，超過一半的團契和查經班處於生存邊緣，參與人數不到20人。這些超小型團契和查經班通常遠離大城市地區，由志願者負責照顧和領導。[[21]](#footnote-21)

圖1: 德華福音會網絡華人教會的分佈情況[[22]](#footnote-22)



**3 對移民經驗的分析和移民教會的功能作用**

3.1 **對德國華人移民移民經歷之反思**

若要定位華人移民教會之功能性，首先需要深入研究移民經驗以及移民者的物質和精神需求。一般與移民相關的危機經驗可能出自地域和國家間的遷移，其中涉及許多過渡和斷裂。此外，還需要考慮與文化相關的危機經驗，例如從一個具有明顯的“羞恥文化”[[23]](#footnote-23)的集體社會轉變為更加個人主義的客居國環境，對於華人移民來說可能尤為嚴重。[[24]](#footnote-24)語言和社會文化背景也帶來了困難。在華人移民教會內部，儘管存在一個集體的、認同性強的中華文化意識，但在族裔群體之間仍可能存在一些潛在衝突，例如在政治文化上的爭議（香港的民主運動，大陸與臺灣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在母國出生的第一代與在“異國”長大的第二代之間的世代衝突。與德國（本土）社會相比，相互界限和排斥的趨勢可能導致移民教會的“孤立化”。

 考慮到基本的危機帶來的經驗斷裂，宗教信仰在自我尋找和定位過程中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從心理學和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對宗教的傾向首先應被理解為對身份認同、道德支撐、方向感和認可的實際需求之表達及結果。[[25]](#footnote-25)在散居背景下，基於功能性宗教概念，宗教在個人和集體認同建構以及危機應對方面發揮作用（“散居效應”）[[26]](#footnote-26)。華人移民教會也應被歸入這一解釋框架中，它們不僅是宗教生活的場所，也是多功能的社會文化中心，傳遞一種“家園”的感覺。

 前一部分已經提及，最近湧向德國的華人移民潮特點在於其移民群體主要為第一代年輕留學生，他們也構成德國大學外國留學生中最大的群體。[[27]](#footnote-27)由於語言障礙，他們需要在德國的學習和生活方面獲得實用的幫助。這些實際挑戰伴隨著情感上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源於擺脫傳統和家庭背景的危機經歷。尤其是年輕的學生在融入新環境時渴望建立真實的友誼關係，這種關係不僅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而且在特殊的生命時刻（生日）和儀式（婚禮、洗禮）中尤為重要。鑒於與本地社會的初始陌生感和對生活條件的困惑，他們尋求分享過度困惑、疏離和歧視的危機經歷的空間，往往會求助於移民自發組織。對於這些獨自一人來到客居國的移民來說，移民自發組織（包括移民教會）充當情感和心理安全以及保護的場所。作為一種“替代家庭”和社交場所，它們幫助他們免受在陌生環境中的孤獨感的困擾。[[28]](#footnote-28)

 鑒於這些新的發展，其他華人教會和宣教士（主要來自香港、臺灣和美國）正在制定一種針對中國留學生需求的“宣教策略”。[[29]](#footnote-29)德國的大學城被視為重點宣教工場，以接觸中國留學生。這種特殊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華人教會在德國的當前功能角色，但也帶來了許多挑戰。

## 3.2 德國華人教會的多維功能

 德國華人移民教會的歷史與華人在德國的移民史密切相關。隨著眾多移民潮湧入德國，華人移民教會應運而生，其滿足移民們在精神、文化和社交需求方面的渴望。對許多移民而言，這些教會不僅僅是崇拜和宗教信仰的場所，更是他們在異國他鄉的家園，[[30]](#footnote-30)是一個擴展的家，在這裡他們可以真實地展示自我，實踐自己的習俗，品嘗地方特色菜，說自己的語言，自由地分享他們的挫折和希望。“我們都是一家人”——這是華人移民教會中最常聽到的口號之一，其充分展示了人類生活層面與精神層面之間的深度聯繫。

 在前面所述之背景下，儘管不同的華人移民教會有不同的重點，但出現了一系列多維功能，其表現形式各異。宗教、救助和社會文化維度的緊密融合，可以概括為以下十個方面的功能：[[31]](#footnote-31)

 (1) 對信徒而言，華人移民教會首先作為宗教生活的中心。它們的核心是主日崇拜和在平常日的小組和團契。華人移民教會是華人基督徒相聚的場所，他們可以因為共同的語言和文化而交流信仰。雖然在講台上牧師會強調基督徒身份優先於族裔身份，但實際上後者可能起到更為主導的作用。[[32]](#footnote-32)

(2) 在這一背景下，華人移民教會還扮演著文化和傳統的守護者的角色。講中文被賦予了重要的意義。"我希望我的孩子在教會裡學習和使用中文。" - 許多母親通過這種方式表達了她們對孩子語言教育的實際需求，而華人移民教會在這方面也確實予以關注。[[33]](#footnote-33)除了傳統價值觀（如孝道）之外，還包括特定的文化習俗，例如慶祝華人傳統節日，這些都是共同的文化特徵，需要得到保留。[[34]](#footnote-34)因此，每華人移民教會會一起慶祝春節、端午節和中秋節等傳統節日。此外，中華飲食文化也扮演著一個不可忽視的角色。遵守傳統節日和實踐飲食文化被視為教會的情境化表達。

(3) 因此，移民教會為移民提供了情感和心理支持，給予他們安全感和歸屬感。移民可能會伴隨著創傷性的危機經歷，例如文化衝擊、歧視、排斥和失敗等。家庭凝聚力的氛圍使移民能夠獲得方向感，獲得心理穩定，並培養出自主塑造生活環境的能力。

(4)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教會的救濟服務，華人移民教會在德國提供這些服務，並試圖填補由國家福利系統留下的供應空白。因此，在一些華人移民教會，每年都會舉辦迎新活動，為新來留學生提供關於住房、就業機會、簽證事務、語言課程、健康保健等實用資訊，通過工作坊（以後也通過社交媒體）方式呈現。教會成員會提供實際的幫助，例如在搬家時提供實際的支持。第（3）和（4）點是在華人基督徒圈子中一個核心價值觀的具體體現，用中文形象地表達為 "愛的團契"。

(5) 這些方面第（3）和（4）點是在廣泛的社交網路基礎上運作的。在華人文化中，人際關係（“關係文化“）起到核心作用。[[35]](#footnote-35)作為一個大家庭的教會，在其社會學功能的框架內，它作為組織各種社交活動（如體育賽事、徒步旅行和其他非正式聚會）的平臺和場所，旨在促進人際關係並擴大社交網路。教會本身也是重要的商業聯繫聚集地。因此，“關係”一詞被賦予重要意義，因為在神學上，它被理解為與上帝的關係之衍生物，具有受造性和精神性的雙重維度。

(6) 在這一背景下，經常被忽視的一個功能為社會地位的重建。[[36]](#footnote-36)移民經歷往往伴隨著社會地位下降的經歷。許多華人移民通過在華人移民教會的等級結構和認可機制下被賦予新的地位，實現了社會地位的恢復。許多移民被任命為執事、長老或同工，這對於因移民而失去社會認同和認可的人來說是一種補償。筆者在一個華人移民教會中經歷了一個顯著的例子：李博士先生（名字已更改）是一位經濟學博士，在德國經營著一家小餐館；由於他多年來在教會中的存在，他贏得了聲譽，並且總是受到周圍人的尊重，稱之為李博士。

(7) 在福音派範圍內促進了不同教派之間的共同合作。事實上，儘管主要的宣教士來自不同的教派背景，但在德國散居環境下，華人移民教會之間有著明顯的共同點。[[37]](#footnote-37)尤其是第一代移民似乎更注重奉獻精神，而不是具爭議性的教派或神學問題。超越教派的特點往往體現在教會公眾的信仰認同中。對於靈恩派、天主教教會，以及對於德國新教教會聯盟（EKD）以及中國大陸的三自教會，他們則有一種相對劃清界線的態度。

(8) 對於許多華人移民教會來說，宣教或傳福音是他們自我理解的核心功能。[[38]](#footnote-38)然而，不同的教會在這方面的表現有很大的差異。傳福音的策略通常是以族群中心主義為基礎的，並且自最近的移民潮以來，對中國留學生有著明顯的關注。華人移民教會會付出很大努力（例如舉辦特殊活動和建立人際關係），以保持對學生的吸引力。儘管大多數教會由宣教士領導，但很少讓跨文化宣教之重要性成為教會普遍的認知。

(9) 因此，在社會和跨文化方面，華人移民教會作為德國本土社會和教會之間跨文化橋樑之功能並不明顯。[[39]](#footnote-39)在與德國社會的關係上，華人移民教會通常不視自己為其教會成員的代表，也不會鼓勵他們多一些社會參與。與德國教會的接觸通常僅限於特別邀請德國牧師講道，或者偶爾參加福音聯盟的跨文化禱告聚會。在教會和本地環境之間起到橋樑作用的德國工作人員也相對較少。

(10) 迄今為止，研究文獻中鮮有關注的是移民教會作為「內部跨文化交流和和解交匯點」的功能角色。從筆者們的觀點來看，他們的優勢在於其內部的跨文化性，這源於不同的移民浪潮。在其教會名稱（華人教會）中，有意選擇了廣義、包容性的華人定義，包括具有不同民族背景、社會經濟地位和政治背景的華人。在華人移民教會中，有時也會公開展現不同政治和文化爭議的觀點，這種隱藏的衝突可能會通過複雜的角色構成（例如主要教會成員來自中國，而牧師來自臺灣和香港）進一步加劇。因此，筆者們在2019/2020年香港大規模抗議活動（被稱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期間觀察到一些衝突局勢，這嚴重考驗了具有不同觀點的華人移民之間的共處。然而，根據兩位筆者多年的觀察，這些教會首先是一個有造就性的相遇之地，在這裡不同族群可以深入瞭解、揭示各種主導的背景假設，從而減少評判和相互「妖魔化」的傾向。在之後的論述中，有必要進一步詳細探討這一有趣的方面。

 以上非詳盡的列舉展示了移民教會之功能的多樣性和其宗教、救助和社會文化維度的複雜交織。儘管從華人教會的官方信仰宣言中可以看出，他們並不將自己視為文化協會；共同基礎應首先是基督教信仰，相對於種族文化的方面，基督教信仰具有優先權。然而，他們的信仰及精神上的自我理解與族群文化傳統、社會共同體緊密交織在一起，以多種方式相互關聯。實際的救助和社會文化服務，嵌入現有的族群社交網路中，有助於基督徒移民保持穩定的心理狀態，這對於與當地社會接觸和跨教派相遇至關重要。[[40]](#footnote-40)這些功能性的面相再次被納入到神學自我理解的解釋框架中，並由此得出論證；它们是慈善、怜悯和顺从的具体表达，源於上帝的爱，以上帝的命令为指导，最终受耶穌之救恩感動與激勵而履行大使命（太廿八19-20）。在其社會—種族—宗教的多重維度中，移民教會扮演著一個全面的“小宇宙”的功能，在其中宗教生活得以充分展現。

 對於華人移民教會的宣教理解，可以採用華裔宣教學家溫以諾提出的“分類模型”。[[41]](#footnote-41)前兩種類型側重於散居者，而後兩種類型除了散居者外，還關注了客居國其他族群。根據溫以諾對散居宣教學的分類，其目標是全球福音化，然而大多數德國華人教會似乎限制在前兩種類型上；這導致華人移民教會缺乏超越族群的元素，以致於無法與當地人進行密切接觸並建立合作夥伴關係。[[42]](#footnote-42)

 德國華人移民教會在與當地社會和德國教會的跨文化關係也同樣缺乏建設性。大多數華人移民教會的定位以明顯的族群中心的宣教目標和單一族群的宗教活動為特徵，這在社會環境方面對教會成員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具體的生活實踐場所和意見和意願形成的機構，它們塑造了移民的思維和行為模式。華人移民教會幾乎沒有承擔社會利益代表的功能，儘管他們可以真實地表達對華人移民在當地社會的不足之處。在跨文化的教會合一方面，現有的跨文化潛力在很大程度上並未得到充分利用。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華人移民教會作為內部跨文化交流和和解的場所，其功能角色尚未得到充分發揮，但具有很大的潛力。基本上，這種潛力源自不同移民潮帶來的內部跨文化特性和散居效應。移民教會有意朝著開放的華人文化理解取向，將具有不同族群和政治背景的成員聚集在一起。面對不同的文化差異經驗，他們被挑戰，在以基督教信仰的光照下，對自己的身份進行反思。尤其是年輕的學生部分展現出對其他族群包容性相處的開放態度。通過建基於基督的合一，移民教會雖然沒有完全放棄民族國家—政治取向的思維，但至少在基督教共同體的背景下得到相對化的看待。在這個意義上，移民教會可以成為一個具有建設性的經驗和學習場所，讓人們學習如何處理文化上的陌生經驗，並實踐出具有生活實際意義、基於聖經和神學的和解。因此，它構成了一個神學地點（*locus theologicus*），[[43]](#footnote-43)通過聖經和神學的重新反思，在散居環境中形成和實踐華人散居群體的神學，即人為神創造之物的尊重與族群之間和解相關的神學。[[44]](#footnote-44)

這一分析表明，德國華人移民教會主要扮演著社會文化、社會福利和以族群為中心的宗教功能。然而，社會跨文化的橋樑作用在他們的自我認知中卻很少得到重視。不可忽視的是，這種單向的基本取向在特定環境和具體情況下有可能促進族群“隔離區”（Ghetto）的形成。在基督福音信仰的背景下，在此筆者對德國華人移民教會提出具體的問題，好作神學反思，涉及到它們自身的未來可持續性和前景。然而，一個明顯的亮點是德國華人基督教教會內部的內部跨文化潛力，它是一個神學地點的起點，它可以發展出一種以散居為導向、以文化開放為特點、超越民族國家政治邊界的尊重與和解的神學。這個啓發性的出發點可以在進一步的神學思考中發揮作用，將內部跨文化的邏輯延伸到與當地社會和德國教會的交流中。

**4. 跨文化教會合一的挑戰和潛力**

 接下來筆者們對德國華人移民教會之未來挑戰和跨文化共融的潛力進行一次簡要的反思，作為展望和啟發。

 財務和結構上的弱勢可能仍然是許多德國華人移民教會面臨的巨大挑戰，這部分可能也是由高比例的學生人口造成的。此外，一些德國華人移民教會的社會經濟結構在過去幾年中發生了快速變化：隨著留在德國的畢業生數量增加和需求多樣化的出現，以學生為中心的教會策略常常受到質疑。從筆者們個人觀察來看，華人基督教網絡未來的核心挑戰將是如何在基督教信仰的指引下，發展和提倡出有別於民族飛地為舒適圈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德國華人移民教會的族群中心、內部取向和對崇拜活動的關注，顯示出其對公共利益和社會關注的減少。與此同時，德國華人基督徒普遍對德國大學、學院中神學一概而論持保留態度、（因有距離的外在視角缺乏而導致的）對自身神學缺乏反思和批判性探討、較少明白教會合一的核心意涵，以及對當前世俗社會傾向採取絕對的對比身份。至今為止，德國華人移民教會尋求和社會成為合作夥伴的意願非常有限。這導致了明顯的不對稱性：華人基督教教會網絡在對待華人族裔群體的社會福利和宗教功能方面具有強大的包容性，但在與當地社會和德國教會的接觸方面則相對排他。[[45]](#footnote-45)

 根據筆者們的觀點，移民教會內部的跨文化特質具有很大的潛力，這些教會有望成為“實踐場地”，在面對不同的種族政治觀點時，教會成員可在其中進行差異體驗和學習實踐出基於愛和和解的基督信仰價值觀。因此，移民教會被證明是神學的學習地點，不僅因為它們是全球化移民現象背景下的具體表達，更因為它們本身是一種新的、能夠產生豐富成果的神學泉源。這樣一種以追求對話和和解為基礎的、以開放的華人文化為出發點的、還需要進行系統性闡述和發展的散居神學，在福音信息的光輝下，對不同民族群體之間的理解產生積極影響。[[46]](#footnote-46)

 在這個背景下，一個現象值得特別關注。近年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政治的崛起，其他在德移民自發組織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比如得到中國大使館支持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簡稱學聯（CSSA））。[[47]](#footnote-47)這些組織經常為中國留學生和其他華人移民提供類似甚至更全面的實際説明和諮詢服務。在這種背景下，華人移民教會面臨著重新審視自己的教會和傳福音策略，並重新塑造自己形象的挑戰。正是跨越邊界的特點，廣泛開放的華人文化觀念，以及基督教合一的基礎，將移民教會與以國家政治為導向的學聯區分開來。前者提出了一種與世俗世界觀不同的概念，並為生活在流散中的移民提供了一個可能陌生但有吸引力的、以尊重和和解為基礎的共同生活視角，這種視角源於基督信仰的自我認知。

此外，移民教會內部真實存在的跨文化潛力作為相遇和經驗的空間，可以再次在神學地點的意義上提供靈感，將基於聖經的跨文化邏輯延伸到與本土社會和本土教會的相遇中。[[48]](#footnote-48)對於華人移民教會的可持續性和未來發展能力來說，加強其社會跨文化功能可能至關重要。最後，種族封閉對於本土情感深厚的父輩一代和在寄居國成長的第二代華人（按廣義定義）之間的關係存在巨大的衝突可能性，對於後者來說，傳承父母的虔誠方式可能會帶來困難。然而，在與本土德國文化更為熟悉的新一代中，也存在著巨大的機會：[[49]](#footnote-49)基於他們自己的散居經歷，他們可以承擔起建設性的橋樑作用，支持華人移民教會在履行其社會跨文化角色時的發展。

 華人移民教會能夠充分發揮多大程度的跨文化潛力並最終建立平等、富有成效的合作夥伴關係，這並不是單方面的過程。從筆者們的觀點來看，這取決於各方的努力，包括德國本地人（積極的法律框架和跨文化開放）、移民（學習語言和本土文化的意願）、德國教會（掌握跨文化能力）和移民教會（合作意願）。在跨文化的共融中，我們需要認真面對各種挑戰，例如不同的社會背景、結構和文化差異。特別是準備相互學習的內在態度，可以積極影響這一過程：德國本地神學的認知性、科學基礎的方法以及對公共神學的關注可以極大豐富移民教會；反過來，移民教會對聖經的熱忱、對救贖的關注以及較少系統化的直覺實用型神學思考，也可以給本地教會帶來啟發與正面影響，成爲在本土社會中福音的管道。

# 5. 總結與展望

 在德國背景下，華人移民教會是一個複雜而多層次的現象。儘管它們常處於一個明顯流動的形成、成長和衰亡的情境中，但它們毫無疑問地將成為德國教會生態中的一部分，並且是多元化的德國社會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本文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力圖對德國華人移民和德國華人移民教會之當前情況進行簡要概述，並隨後對德國華人移民教會的多功能角色與跨文化潛能進行深入分析，這些角色既與普遍的移民經歷有關，也與特定的文化驅動的散居經歷相適應。

 可以清楚地看到，移民教會不僅作為真正的宗教中心，而且也作為社會文化的孤島和心理情感的避風港。然而，對原有社會文化的保護空間有時反過來卻形成了一個族群隔離的飛地，它在移民教會和德國主流文化之間劃出了一條隱形的界線。至今為止，教會尋求社會作為合作夥伴的具體努力很少，儘管考慮到他們的未來發展，他們迫切需要一個新的、以開放為特徵的跨文化神學認識，使得重新反思與本地人與本地教會的關係。在面對未來的挑戰和跨文化共融的必要性時，筆者們意識到德國華人移民教會內的族裔群體擁有巨大的跨文化潛力，這種潛力可以在基督教信仰的光照中延伸到與本地社會和教會的相遇，以超越界限、愛和和解接納的方式發展。為了充分發揮豐富的跨文化潛力，需要有一種動態的雙向互動，既包括華人移民和移民教會，也包括本地教會和本地社會的貢獻。這種互動不應僅限於救援和文化交流，而應包括創造性地利用雙方的神學資源，與移民和本地人的具體生活現實相關聯。

 華人移民教會的多維度特徵還處於初步研究階段，目前的瞭解仍然不夠充分。對於進一步的研究來說，以下主題可能是重要、有啓發性的，包括：（1）福音傳播策略；（2）不同族裔群體之間的文化宗教差異；（3）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以及（4）與德國教會存在的互動。毫無疑問，移民教會不僅對個體成員也對德國本土的跨文化共存至關重要，而且從宏觀的角度對基督信仰團體作爲普世多元文化之團體也具有重大意義。按照聖經的要求，基督徒應當團結合一，使基督身體之末世性恩賜(eschatological gift of the body of Christ)變得可見。

**Abstract:**

This paper seeks to provide a holistic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the Chinese migration church in the network of the *Forum für Mission unter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FMCD; engl. Forum for Mission among Chinese in Germany) with a focus on their multidimensional functional purpose. It is shown that the migration communities by no means function only as genuine religious centers, but also as socio-cultural islands and psycho-emotional safe havens. Paradoxically, however, the sociocultural shelter ends up as an ethnically isolated enclave. In view of their future viability, in the view of the authors, a new profile and theological self-understanding, characterized by transcultural openness, could be of essential importance. The enormous intercultural potential of the ethnic groups within the migration communities can be used to extend the logic of crossing borders and acceptance in love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into the encounter with the native society and churches. In the end, for the fruitful intercultural potential to be realized, a dynamic multi-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actors, with mutual willingness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is desirable.

**Authors:**

Tianji Ma, PhD in Theoretical Chemistry at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studied Protestant Theology at the FTH Giessen; PhD student at the KiHo Wuppertal; missionary of OMF Germany and lecturer at Lutheran.

Szu-Chin Chen, Master study of history in Taiwan; Master study of Protestant theology at Ruhr-University Bochum; missionary of OMF Germany.

**參考書目Reference:**

Alumkal, Antony W. *Asian American evangelical churches: race, ethnicity, and assimilation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2003.

Bourdieu, Pierre. *Praktische Vernunft: Zur Theorie des Handelns*.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98.

Carlson, Kenneth P. “Patterns in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Ministry in a Chinese Church,” in *Asian American Christianity*: *A Reader*, edited by Viji Nakka Cammauf and Timothy Tseng, 121-126. Castro Valley, Calif.: Pacific Asian American and Canadian Christianity Education Project (PAACCE) and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Asian American Christianity (ISAAC), 2009.

Chao, Paul K. *Chinese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Lahn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6.

Chong, Kelly. “What It Means to Be Christia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and Boundary among Second-Generation Korean Americans,” *Sociology of Religion* 59, no. 3 (1998): 259-286.

Cohen, Paul A.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in *Late Ch'ing 1800-1911,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edited by John King Fairbank, 545-5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Destatis. Bevölkerung und Erwerbstätigkeit: Bevölkerung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Bevölkerung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 Ergebnisse des Mikrozensus 2019, Fachserie 1, Reihe 2.2. Wiesbaden: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21.

Dümling, Bianca. *Migrationskirchen in Deutschland: Orte der Integration*. Frankfurt/Main: Lembeck, 2011.

Füssel, Kuno. “Die Zeichen der Zeit als locus theologicus,” *ZPhTh* 30 (1983): 259-274.

Giese, Karsten. “New Chinese Migration to Germany: Historical Consistence and New Patterns of Diversification within a Globalized Migration Regim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1, no. 3 (2003): 155-185.

Girtler, Roland. *Methoden der qualitativen Sozialforschung: Anleitung zur Feldarbeit*. Wien: Böhlau, 1984.

Hall, Bria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among Chinese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Sociology of Religion* 67, no. 2 (2006): 131-147.

Huang, Yuqin. “Taking Jesus Back to China. New Gospel Agents in Shanghai,” in *Sinicizing Christianity*, edited byYangwen Zheng, 82-108. Boston: Brill 2017.

He, Zhining. “Die chinesische Minderheit und ihre Integration in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Köln, 2007.

Jeong, Yang-Cun. *Koreanische Immigrantengemeind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ie Entstehung, Entwicklung und Zukunft der koreanischen protestantischen Immigrationsgemeind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eit 1963*. Frankfurt am Main: Lang, 2008.

Kang, Jie.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Germany: Home-Making and Chineseness,” in *Chinese Religions Going Global*, edited by Nanlai Cao et al., 97-114. Leiden: Brill 2021.

Kim, Luther Jeom O. *Doing Diaspora Missiology Toward Diaspora Mission Church. The Rediscovery of Diaspora for the Renewal of Church and Mission in a Secular Era*. Eugene: Wipf and Stock, 2016.

Körtner, Ulrich H. J. “Theologie der Diaspora als öffentliche Theologie,” in *evangelisch glauben - Nüchtern hoffen. Beiträge zu einer Theologie der Diaspora,* edited byEnno Haaks, 99-105. Leipzig: Gustav-Adolf-Werk, 2015.

Latourette, Kenneth S. *The 19th century outside Europe: The Americas, the Pacific, Asia and Africa* (Christianity in a Revolutionary Age, Vol. 3).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9.

Leung, Maggi W.H. “Memories, Belonging and Homemaking. Chinese Migrants in Germany,” in *At Home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Memories, Identities and Belongings*, edited by Eng Kuah-Pearce Khun and Andrew P. Davidson, 164-18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Lüdde, Johanna. “Nur eine Coping-Strategie unter vielen: Die Konversion chinesischer Studierenden in Deutschland zum Christentum evangelikaler Prägung,” *ZfR* 21, no. 2 (2013): 145-176.

Mayer, Ruth. *Diaspora: Eine kritische Begriffserklärung*. Bielefeld: transcript, 2005.

Mayring, Philipp. *Einführung in die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5th ed. Weinheim / Basel: Beltz, 52003.

Meng, Hong. *Das Auslandsstudium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1861-2001: Ein Beispiel internationaler Studentenmobilität im Rahmen der chinesischen Modernisierung*. Berlin: Peter Lang, 2005.

Nagata, Judith. “Christianity among Transnational Chinese: Religious versus (Sub)ethnic Affili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3, no. 3 (2005): 99-130.

Nagy, Dorottya. “Envisioning Change in China. Evangelical Missionary Work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Germany,” *Social Sciences and Missions* 27 (2014): 86-115.

Oblau, Gotthard.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Chance christlicher Begegnung.* Hamburg: China Info-Stelle EMW, 2006.

Polak, Regina and Martin Jäggle. “Gegenwart als locus theologicus: Für eine migrationssensible Theologie im Anschluss an Gaudium et spes,” in *Erinnerung an die Zukunft: Das Zweite Vatikanische Konzil*, edited by Jan-Heiner Tück, 570-598. Freiburg: Herder, 2012.

Schirrmacher, Thomas and Klaus W. Müller, eds. *Scham- und Schuldorientierung in der Diskussion: Kulturanthropologische, missiologische und theologische Einsichten*. Nürnberg: Verlag für Kultur und Wissenschaft, 2006.

Shen, Qilan. “Between Transnational Mission and Migration Life: Formation and Diversity of an Evangelical Chinese Community in Germany,” PhD diss. Westfälische Wilhelms-Universität Münster, 2010.

Song, Minhee. “Immigrants’ Church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Integr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Local Storytelling Net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2018): 4761-4783.

Wan, Enoch.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2nd ed. Portland: CreateSpace, 2014.

Wang, Yuting and Fenggang Yang. “More than Evangelical and Ethnic: The Ecological Factors for Conversion of Chinese Students to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ology of Religion* 76, no. 2 (2006): 179-192.

Winter, Ralph and Bruce A. Koch. “Finishing the Task: The Unreached People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9 no. 4 (2002): 15-25.

Wu, Jeanne. *Mission through Diaspor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hurch in the USA*. Cumbria: Langham, 2016.

Yang, Fenggang. “Chinese Conversion to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Sociology of Religion* 59, no. 3 (1998): 237-257.

⸺⸺,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Chinese Christian Transnationalism. Diverse Networks of a Houston Church,” in *Religion across Borders: Transnational Immigrant Networks*, eds. Helen Rose Ebaugh and Janet Saltzman Chafetz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002), 129-148.

Yu, Jingyang. “Socialization of Language and Morality a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Berlin,” in *The Nation Form in the Global Age: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edited by Irfan Ahmad and Jie Kang, 329-34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Tham, S. K. *Releasing the Church from Its Cultural Captivity: A Rediscover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eBook. Bloomington: Xlibris, 2015.

Todd, Matthew Richard Sheldon. *English Ministry Crisis in Chinese Canadian Churches: Towards the Retention of English-Speaking Adults from Chinese Canadian Churches through Associated Independent English Congregational Models*, Eugene: Wipf & Stock, 2015.

Huang, Yuqin and I-hsin Hsiao. “Chinese Evangelists on the Move: Space, Authority, and Ethnicisation among Overseas Chinese Protestant Christians,” *Social Compass* 62, no. 3 (2015): 379–395.

Nyíri, Pál. “Moving Targets: Chinese Christian Proselytizing among Transnational Migran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 no. 2 (2003), 263-301.

李衍楊，《德國華人教會對新世代中國留學生的福音策略初探》，教牧博士論文。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 2013。

陶恩光，《歐洲中國留學生宣教之策略與展望》，教牧博士論文，臺北： 正道神學院，2009。

蘇文峰，《中國教會史》, https://www.smyrnasrci.org/wp-content/uploads/1-Chinese-Church-History/CCH-StudentEdition200908.GB.pdf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七十三期 Vol 8, No 3 (July 2023)**

1. 馬天濟擁有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化學博士、德國哈根大學哲學碩士和吉森神學院神學碩士學位。他目前是德國烏帕塔教會大學的博士生和臺灣中華信義宗神學院的訪問講師。陳思瑾擁有臺灣輔仁大學歷史碩士及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基督教神學碩士學位。兩人是OMF International在德宣教士，目前共同投身在德國吉森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的東亞論壇。

聯絡電郵: tianji.ma@omfmail.com; Szu-Chin.Chen@omfmail.com [↑](#footnote-ref-1)
2. 目前有很多關於美國華人教會的文獻（例如Fenggang Yang, “Chinese Conversion to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Sociology of Religion 59/3 (1998), 237-257; Fenggang Ya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Kenneth P. Carlson, “Patterns in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Ministry in a Chinese Church,” in *Asian American Christianity*: *A Reader*, eds. Viji Nakka Cammauf and Timothy Tseng (Castro Valley, Calif.: Pacific Asian American and Canadian Christianity Education Project (PAACCE) and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Asian American Christianity (ISAAC), 2009), 121-126.) ，相較之下對德國背景的研究數量相對有限（例如Gotthard Oblau,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Chance christlicher Begegnung* (Hamburg: China Info-Stelle EMW, 2006), 147-151; Jie Kang,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Germany: Home-Making and Chineseness,” in *Chinese Religions Going Global*, eds. Nanlai Cao et al. (Leiden: Brill, 2021), 97-114; 李衍楊，《德國華人教會對新世代中國留學生的福音策略初探》 (教牧博士論文，中華福音神學院， 2013)) ，大多集中在中國學生的傳教工作和民族—跨國網絡。 [↑](#footnote-ref-2)
3. 詳見 “德国中文图书馆,” *Chinesische Leihbücherei*, Accessed June 15, 2023, http://www.chinese-library.de/ [↑](#footnote-ref-3)
4. 在這方面，布迪厄主張在「雙重斷裂」的框架下採用互補的實踐認識方式：首先是與非科學的知識範疇進行第一次斷裂，然後是通過恢復社會行為者的一手經驗和自我邏輯的實踐意義與客觀主義的認識方式進行第二次斷裂(Cf. Pierre Bourdieu, *Praktische Vernunft: Zur Theorie des Handelns*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98), 40-49.）。 [↑](#footnote-ref-4)
5. 關於參與者觀察研究詳見Roland Girtler, *Methoden der qualitativen Sozialforschung: Anleitung zur Feldarbeit* (Wien: Böhlau 1984); see also Philipp Mayring, *Einführung in die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5th ed. (Weinheim / Basel: Beltz, 2003), 80-84. [↑](#footnote-ref-5)
6. Mayring, *Einführung in die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103-107. [↑](#footnote-ref-6)
7. Cf. Maggi W.H. Leung, “Memories, Belonging and Homemaking. Chinese Migrants in Germany,” in *At Home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Memories, Identities and Belongings*, eds. Eng Kuah-Pearce Khun and Andrew P. David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165. [↑](#footnote-ref-7)
8.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來自香港和臺灣的移民在1950年代來到這裡，其中大多數人在餐飲業工作。 在1960和1970年代，由於越南戰爭和反華情緒的影響，更多的中國難民從東南亞來到了德國。1970年代末，隨著德國大學中國學生的大量增加，開始了新一輪的移民潮，這有助於形成至今的中國僑民景觀。在1990年代，各種移民群體，包括政治避難者和非法移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到德國。 (詳見蘇文峰，《中國教會史》, 34-35. https://www.smyrnasrci.org/wp-content/uploads/1-Chinese-Church-History/CCH-StudentEdition200908.GB.pdf; Karsten Giese, “New Chinese Migration to Germany: Historical Consistence and New Patterns of Diversification within a Globalized Migration Regim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1, no. 3 (2003): 155-185 and Oblau,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footnote-ref-8)
9. Cf. Ya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66-67. [↑](#footnote-ref-9)
10. Cf. Jeanne Wu, *Mission through Diaspor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hurch in the USA* (Cumbria: Langham, 2016), 24. [↑](#footnote-ref-10)
11. Cf. Destatis, “Bevölkerung und Erwerbstätigkeit: Bevölkerung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Bevölkerung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 Ergebnisse des Mikrozensus 2019,” Fachserie 1, Reihe 2.2 (Wiesbaden: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21), 62, 66. [↑](#footnote-ref-11)
12. Cf. Destatis, “Bevölkerung und Erwerbstätigkeit,” 65, 69, 94-95. [↑](#footnote-ref-12)
13. Paul A. Cohen,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in *Late Ch'ing 1800-1911,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ed. John King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545-590; Kenneth S. Latourette, *The 19th century outside Europe: The Americas, the Pacific, Asia, and Africa* (Christianity in a Revolutionary Age, Vol. 3)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9), 431-445. [↑](#footnote-ref-13)
14. Cf. 蘇文峰，《中國教會史》， 33; see also Yuqin Huang and I-hsin Hsiao, “Chinese Evangelists on the Move: Space, Authority, and Ethnicisation among Overseas Chinese Protestant Christians,” *Social Compass* 62, no. 3 (2015): 379-395; Pál Nyíri, “Moving Targets: Chinese Christian Proselytizing among Transnational Migran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 no. 2 (2003): 263-301; Fenggang Yang, “Chinese Christian Transnationalism: Diverse Networks of a Houston Church,” in *Religion across Borders: Transnational Immigrant Networks*, eds. Helen Rose Ebaugh and Janet Saltzman Chafetz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002), 129-148. [↑](#footnote-ref-14)
15. Cf. Kang,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Germany,” 97-114. [↑](#footnote-ref-15)
16. Cf. Yuqin Huang, Taking Jesus Back to China. New Gospel Agents in Shanghai, in *Sinicizing Christianity*, ed.Yangwen Zheng (Boston: Brill 2017), 88. [↑](#footnote-ref-16)
17. Cf. Dorottya Nagy, “Envisioning Change in China. Evangelical Missionary Work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Germany,” *Social Sciences and Missions* 27 (2014): 86-115. 儘管德華福音會作為華人移民教會網路的樞紐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但它認為自己的作用是輔助性的，而不是控制性或主導性的。(Cf. Kang,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Germany,” 102). [↑](#footnote-ref-17)
18. “德国华人基督徒联系”, *Chinesische Leihbücherei*, Accessed October 23, 2021, https://chinese-library.de/de/node/13. [↑](#footnote-ref-18)
19. Cf. Kang,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Germany,” 99. [↑](#footnote-ref-19)
20. Cf. Yuting Wang and Fenggang Yang, “More than Evangelical and Ethnic: The Ecological Factors for Conversion of Chinese Students to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ology of Religion* 76, no. 2 (2006): 180.  [↑](#footnote-ref-20)
21. 總體而言，德國的華人基督徒數量很難估計。根據葛忠良的估計，基於教會和查經班參與者資料，估計德國有超過兩千名華人基督徒，大約占在德華人群體中的1% (參見 Oblau,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87)。 [↑](#footnote-ref-21)
22. 這是在筆者們研究基礎上所繪製（參見中文圖書館）。 [↑](#footnote-ref-22)
23. Cf. Thomas Schirrmacher and Klaus W. Müller, ed., *Scham- und Schuldorientierung in der Diskussion: Kulturanthropologische, missiologische und theologische Einsichten* (Nürnberg: Verlag für Kultur und Wissenschaft, 2006). [↑](#footnote-ref-23)
24. Cf. Johanna Lüdde, “Nur eine Coping-Strategie unter vielen: Die Konversion chinesischer Studierenden in Deutschland zum Christentum evangelikaler Prägung,” *ZfR* 21, no. 2 (2013): 145-176; Qilan Shen, “Between Transnational Mission and Migration Life: Formation and Diversity of an Evangelical Chinese Community in Germany,” PhD diss., (Westfälische Wilhelms-Universität Münster, 2010); Hong Meng, *Das Auslandsstudium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1861-2001: Ein Beispiel internationaler Studentenmobilität im Rahmen der chinesischen Modernisierung* (Berlin: Peter Lang, 2005). [↑](#footnote-ref-24)
25. 馬淩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關注宗教對個體的心理方面以及其在克服生活中的危機和恐懼方面之功能（Bronislaw Malinowski,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Bosten: Beacon Press, 1948) ），而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則強調宗教的社會維度，其表達了道德原則並促進了教會之間的和平共存（Émile Durkheim, *Die elementaren Formen des religiösen Lebe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1) ）。 [↑](#footnote-ref-25)
26. Cf. Luther Jeom O. Kim, *Doing Diaspora Missiology Toward Diaspora Mission Church. The Rediscovery of Diaspora for the Renewal of Church and Mission in a Secular Era*, (Eugene: Wipf and Stock, 2016), 13-14; Ruth Mayer, *Diaspora: Eine kritische Begriffserklärung* (Bielefeld: Transcript, 2005). [↑](#footnote-ref-26)
27. Cf. Oblau,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18-19. 這與在美國的華人大學生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其中約有一半人在美國出生。（參見Brian Hal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among Chinese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Sociology of Religion* 67, no. 2 (2006), 132). 近年來，畢業後留在德國工作並有穩定收入、進而獲得長期居留身份的中國學生人數持續增長中。 [↑](#footnote-ref-27)
28. Cf. Bianca Dümling, *Migrationskirchen in Deutschland: Orte der Integration* (Frankfurt/Main: Lembeck, 2011), 28-35. [↑](#footnote-ref-28)
29. 在國際華人教會網路中，宣教概念通常被定義得非常狹窄，使得宣教和福音傳播經常被用作同義詞。根據溫特和科赫提出的所謂E尺度（Evangelical Scale），該刻度表示基督徒需要克服多大的文化距離來傳達福音，單一文化的華人傳福音屬於E1級別：E1對應的是向與教會沒有接觸的同一文化背景的非基督徒傳福音（參見Ralph Winter and Bruce A. Koch, “Finishing the Task: The Unreached People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9, no. 4 (2002): 16-17.) 。 [↑](#footnote-ref-29)
30. Cf. Kang,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Germany,” 110. [↑](#footnote-ref-30)
31. Jeong指出韓國移民教會對生活在德國背景下的韓國基督徒的五個相關功能：（1）普世的希望；（2）韓國移民教會的核心；（3）情感的家園；（4）賦予生命的社會結構；（5）韓國文化的保存和發展。Cf. Yang-Cun Jeong, *Koreanische Immigrantengemeind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ie Entstehung, Entwicklung und Zukunft der koreanischen protestantischen Immigrationsgemeind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eit 1963* (Frankfurt am Main: Lang, 2008), 57-65。也可參考美國背景下的文獻：Antony W. Alumkal, *Asian American evangelical churches: race, ethnicity, and assimilation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2003); Kelly Chong, “What It Means to Be Christia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and Boundary among Second-Generation Korean Americans,” *Sociology of Religion* 59, no. 3 (1998): 259-286. [↑](#footnote-ref-31)
32. Cf. Judith Nagata, “Christianity among Transnational Chinese: Religious versus (Sub)ethnic Affili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3, no. 3 (2005): 99. [↑](#footnote-ref-32)
33. Cf. Jingyang Yu, “Socialization of Language and Morality a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Berlin,” in *The Nation Form in the Global Age: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eds. Irfan Ahmad and Jie Kang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329-348. [↑](#footnote-ref-33)
34. Cf. Paul K. Chao, *Chinese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Lahn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6). [↑](#footnote-ref-34)
35. Minhee Song, “Immigrants’ Church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Integr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Local Storytelling Net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2018): 4764. [↑](#footnote-ref-35)
36. 參見Zhining He, “Die chinesische Minderheit und ihre Integration in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Köln, 2007), 91-92; He, Minderheit, Chp. 4. [↑](#footnote-ref-36)
37. Cf. Wang and Yang, “More than Evangelical and Ethnic,” 180; Oblau,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104-136. [↑](#footnote-ref-37)
38. Cf. Oblau,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86; “Über uns”, *Chinesische Leihbücherei*, Accessed https://chinese-library.de/de/content/%C3%BCber-uns. [↑](#footnote-ref-38)
39. Cf. Dümling, *Migrationskirchen*, 198-200. [↑](#footnote-ref-39)
40. Cf. Dümling, *Migrationskirchen*, 34-35. [↑](#footnote-ref-40)
41. 溫以諾區分了四種類型的散居地宣教：向散居者的宣教（missions *to* the diaspora）、通過散居者的宣教（missions *through* the diaspora）、由散居者和超越散居者的宣教（missions *by* & *beyond* the diaspora）、與散居者一起宣教（missions *with* the diaspora）。參見Enoch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2nd ed. (Portland: CreateSpace, 2014), 8. [↑](#footnote-ref-41)
42. 在全球化時代，對這種以民族中心主義為內部取向的宣教和教會的理解的批評，見：S. K. Tham, *Releasing the Church from Its Cultural Captivity. A Rediscover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Bloomington: 2015), 93-94; Matthew Richard Sheldon Todd, *English Ministry Crisis in Chinese Canadian Churches. Towards the Retention of English-Speaking Adults from Chinese Canadian Churches through Associated Independent English Congregational Models* (Eugene: Wipf & Stock 2015), 26. [↑](#footnote-ref-42)
43. 在較新的神學思考中，神學地點（Loci）不僅有使神學論述合法化的功能，更是產生新的神學論述。Cf. Kuno Füssel, “Die Zeichen der Zeit als locus theologicus,” *ZPhTh* 30 (1983): 259-274 and especially Regina Polak and Martin Jäggle, “Gegenwart als locus theologicus: Für eine migrationssensible Theologie im Anschluss an Gaudium et spes,” in *Erinnerung an die Zukunft. Das Zweite Vatikanische Konzil*, ed. Jan-Heiner Tück (Freiburg: Herder, 2012), 570-598. [↑](#footnote-ref-43)
44. 歐洲福音派教會聯合體（GEKE）的工作小組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散居者的神學》（*Theologie der Diaspora*）的著作。其中宣導了一種散居神學，它不是通過從世界中退縮來保護自己在異鄉的存在，而是鼓勵教會和基督徒個體“以批判性和建設性的態度參與社會，並成為人們當前困境和經驗中的教會”。 (Mario Fischer and Miriam Rose, eds., *Theologie der Diaspora: Studiendokument der GEKE zur Standortbestimmung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n im pluralen Europa* (Leipzig: Gustav-Adolf-Werk, 2019), 22). 《散居者的神學》認為「散居的意義在於按照基督的跟隨方式塑造關係的豐富性… 通過強調關係的散居概念之力量，使散居團體的生活聯繫的多元聲音得以顯現，並被視為重要的塑造任務。」 (Fischer and Rose, *Theologie der Diaspora*, 8). [↑](#footnote-ref-44)
45. 陶恩光指出，華人移民教會與其他（非基督教）移民自發組織也存在明顯的區別。他提到的原因包括既有（人員）衝突以及他們對其他華人移民自發組織的宗教信仰取向持有一種趨於疏離的態度。(參見：陶恩光，《歐洲中國留學生宣教之策略與展望》（教牧博士論文，臺北： 正道神學院，2009），27). [↑](#footnote-ref-45)
46. Cf. Fischer and Rose, *Theologie der Diaspora*, 21-22. [↑](#footnote-ref-46)
47. Cf. Kang,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Germany,” 106.113. [↑](#footnote-ref-47)
48. 柯特納呼籲建立一種散居神學，是一種將自身視為公共神學的形式。Cf. Ulrich H. J. Körtner, “Theologie der Diaspora als öffentliche Theologie,” in *evangelisch glauben - Nüchtern hoffen: Beiträge zu einer Theologie der Diaspora*, ed. Enno Haaks (Leipzig: Gustav-Adolf-Werk, 2015), 99-105. [↑](#footnote-ref-48)
49. 這篇文章的作者本身就在第二代華人中工作。 [↑](#footnote-ref-49)